

西方战略

〔联邦德国〕 赫尔穆特·施密特 著



西方战略

〔联邦德国〕 赫尔穆特·施密特 著

陈炳辉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Helmut Schmidt
Elne Strategie für den Westen

Berlin, Wolb Jobst Siedler Verlag, 1986

根据柏林西德勒出版社1986年德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高曾蓓

封面设计：施本铭

西 方 战 略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 著

陈炳辉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3.625 字数：81,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012-0126-9/D·13 定价：1.10元

出版说明

赫尔穆特·施密特是联邦德国著名的“全能政治家”。他在担任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期间，在防务和财政两个方面均有重大建树。他在担任总理期间，对北约通过对付苏联SS-20导弹的“双重决议”，以及为对付美国转嫁经济困难而建立欧洲货币体系，都起了关键作用。在联邦德国，施密特被认为是颇有见地的军事战略家、权威的国际经济学家、善于雄辩的演说家。施密特在离开政坛以后，仍从事国际政治斗争战略和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他撰写回忆录，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去各地做报告，被喻为联邦德国的基辛格。

本书是施密特的近著，书中介绍了1985年他在美国耶鲁大学所作的几次重要报告的内容。施密特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并为西方设计了一整套总战略。施密特认为，西方需要有一个“大战略”，一个共同的安全政策，以捍卫自由和繁荣。如果各国自行其是，单枪匹马，则必遭失败，这对中等国家如法国、日本和联邦德国是这样，对超级大国美国也是这样。施密特在谈到美国和西欧的关系时指出，美国需要欧洲，欧洲需要美国。然而美国孤家寡人的倾向引起了盟国的不安和失望。他认为，西方还远远没有联合起来，主要原因在美国，欧洲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由于缺乏合作和领导，欧洲越来越丧失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关于东方政策，施密特指出，

应在安全的基础上同苏联合作。对苏联的政策是西方战略的基石。但因深刻的历史原因，对苏联应采取两手政策。施密特在书中还对德国统一问题和中国的内外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施密特是一位从政几十年的联邦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为了使读者全面地了解他的战略设想和他对所论述的问题的观点，我们将本书按原文译出。他的思想和观点在西方有不小的影响。所以，本书对于了解和研究西方国家的战略思想和对外政策的策略考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缺乏一个共同的总战略	(1)
	什么是总战略?	(2)
	西方总战略的四个时期.....	(4)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特殊处境...	(13)
	欧洲的退役.....	(14)
	苏俄稳定的总战略.....	(16)
第二章	欧洲的作用与问题	(19)
	安全问题.....	(20)
	经济问题.....	(27)
	西欧的政治范围.....	(32)
	美国的控制.....	(38)
第三章	在 NATO 以外三个地区的问题	(43)
	拉丁美洲的债务问题.....	(43)
	中美洲.....	(51)
	中东.....	(55)
	远东.....	(63)
	暂时的总结.....	(68)
第四章	经济与财政政策的挑战	(71)
	世界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	(71)
	美国赤字定时炸弹.....	(75)
	关于“经济首脑会议”	(82)

	东西方贸易.....	(84)
第五章	协调一致与领导意志.....	(86)
	缺乏领导.....	(96)
第六章	一种“最佳情况”的设想.....	(98)
后 记	〔美〕威廉·邦迪	(105)
本书出版经过	〔美〕威廉·福尔茨	(109)

第 一 章

缺乏一个共同的总战略

我想在本书中阐述我在15年国际政治活动的经验中得出的一个中心论点，这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国家战略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或者确切地说：在西方世界经济政策与安全政策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无论日本、法国、英国、德国^①、意大利和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还是美国这样的大国都不能只依靠它们国家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经济与政治目标，或者获得外部的安全。

尽管它们采取联合行动，但如果它们不协调安全政策，也不可能达到它们的经济目标。仅仅通过防务或军备控制方面的合作，它们也不可能获得外部的安全，更确切地说，它们必须同时协调它们的经济政策。

在大约45年前，温德尔·威尔基说：“没有经济国际主义的政治国际主义是一座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地得到充分的发展。”今天，他也许会补充说，颠倒过来的说法不仅是适用的——共同的经济福利也要求高度的政治合作与相互支持——，而且除此之外，两者使得协调的安全政策成为必要的了。

长期以来，对于较小的国家来说，这种相互关联是清楚

^① 指联邦德国。——编者

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份量越小，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压力就越大。这种情况在荷比卢三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大公国——是十分明显的。它们其中任何一个如果想单独行动，毫无疑问会遭到失败。在布鲁塞尔、海牙或卢森堡每一个人都理解这点，并会认为，考虑一个纯粹的国家经济政策、一个纯粹的国家外交政策，或一个纯粹的国家安全政策，都是过时的荒唐的事情。

但是一个国家越大，有时候就越容易受到单独行动的诱惑。戴高乐将军在法国防务政策上就抵挡不住这种诱惑。与此相反，今天，每一个法国人，包括共产党人，都知道，没有外国的帮助，法国就不能自卫。英国人根据自己本世纪的经验也知道，不依靠帮助他们是不能自卫的。但迄今大多数英国人还认为，一再地试验在经济政策上走自己的路是可能的、值得一试的。迄今为止，这种政策在英国使得350万人失业——比50年前萧条开始之时还要多。

受到这种单干最大诱惑的当然是美国。从历史和心理上来看，单干倾向在于美国的孤立主义。有时对盟友的失望也助长了这种倾向，但有时是自认为美国的力量无可匹敌的狂妄意识加速了这种倾向。20年前，参议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就选择“强国的气焰”这样的题目作为书名。

总之，单个的西方国家要在纯粹的国家基础上获得成功，总是一种幻想。没有协调的，或被接受了总战略而想实现共同政策的企图也是幻想。

什么是总战略？

我用“战略”一词是指什么呢？今天，几乎每一个人都

说有战略。对饮料业的广告经理人员来说就是推销和出售的战略，对足球教练来说就是比赛的战略，在美国叫做“比赛计划”。经济学家向他们的政府鼓吹经济战略，当然，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存在军事战略，而且3000年以来都存在着，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根据军事涵义使用这个词。

为了避免此词的各种涵义相互混淆，我将依次地谈谈外交政策、经济政策以及从经典意义来谈军事战略。然而，我相信，所有这三个方面最终都必须在同一范围内进行活动，不管我们现在把这一范围简单地称为国际关系，还是用文雅的语言把它称为当今世界的跨国结构。每个民族，或每个国家集团给自己确定的目标在这三个领域中都必须是坚定的。简单地说，它们必须由一个统一的方案所引导，我所说的总战略，或“大战略”，就是这个总方案。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大战略”这一概念是大约30年前由利德尔·哈特使用的^①。这个著名的英国作家与思想家原先是军事战略分析家。后来他把他的思考扩大到一般外交政策方案的领域，并得出结论，即这两个政治领域在一系列国家中经常是紧密地，如果不是不可分的话，相互联在一起的。在他所著《战略》一书中可以找到他的见解的一个例子。他的美国读者不得不认为这个例子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利德尔·哈特说：“和平的国家易于无意中引起危险。如果出现危险，和平的国家比好战的国家更容易作出极端的决定。由于贪婪而进行战争的国家，如果它们发现不能轻而易举地战胜对手，那它们通常很快地准备停止战争。犹豫不决的，由于感情冲动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被动员起来的战士，易

① 利德尔·哈特最早使用这一概念是在将近60年前的1929年，见他在那一年出版的《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一书。——编者

于把战斗更艰苦地进行到底。”

我认为，这种观察看来很正确。利德尔·哈特关于国家在战争中的态度的描述，有助于说明美国在和平时期政策的摇摆倾向。在此，一种延长的“朦胧的斗争”——如同约翰·菲·肯尼迪所说的——特别属于这种情况。这种斗争东方与西方差不多进行了40年。美国人喜欢把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最好是通过技术，找到干净利索的、持久的解决办法。这种态度不是在支持战略防御计划（SDI）的行动方式吗？

我将提到这点，并提到其他当前的问题。首先我想回顾一下现代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的历史。我认为，这段历史表现出四个相当明显的时期。在这期间，西方以不同程度的一致性奉行不同形式的总战略。

西方总战略的四个时期

西方总战略的第一个时期是相当短暂的，我把这个时期称为同苏联进行合作的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企图同苏联进行广泛的合作。在旧金山成立了联合国。在布雷顿森林搞了一个国际货币体系。巴鲁克计划规定，苏联人分享美国原子研究与发展的成果。此外，这种提议是符合亨利·史汀生陆军部长辞职时提出的要求的。最后，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国家，苏联以及美国以前的敌人如联邦共和国，提供经济援助。

在这一时期美国人很快就把他们的武装力量复员了。可是斯大林不这样做。他既不接受巴鲁克计划，又不同意参加马歇尔计划。他宁可为苏联的核武器库，稍晚为氢弹，而最后为导弹与卫星打下基础。他禁止他东欧的卫星国接受马歇

尔计划。他企图干涉希腊，扼杀柏林，他封锁柏林一年之久。所有这一切事件导致1948和1949年西方在哈里·杜鲁门的领导下结成了西方联盟。

在那短暂的第一时期，西方的领导国家向每一个国家都提供合作，可是苏联拒绝了这一建议。结果是开始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是以冷战与军备竞赛两个词为特征的。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包围苏联的世界范围的联盟体系。在军事方面，大规模的核报复威胁作为西方的战略是有效的。

与此同时，进行了加强西方本身的各种尝试。在50年代初，试图建立一个欧洲防御联盟，后来失败了。1957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努力导致了罗马条约的签署。如果我们纵观最近这30年，这种努力总的说来是很成功的。这种努力那时候受到美国的鼓励。当时在军事上与经济上，美国占有完全的优势，而它的经济政策一般来说是被人赞赏和接受的。

可是，在冷战阶段，西方总战略的军事部分从来没有摆脱过分歧。在50年代末，它成了激烈争论的问题。我回忆起一本名为《音调不定的号角》的书的巨大作用。作者是美国军队中一位杰出的人物，马克斯韦尔·达·泰勒，他那时正好从美国陆军参谋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泰勒提出了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有巨大的核号角，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吹响这支号角，或者如果我们对吹响这支号角有顾虑，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另外一方会赢得这场冲突吗？他得出的结论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确定的。人们可以不信任那个大规模报复的方案。因此，需要另外一个军事战略和另外一个军事结构。

在西方，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早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另一些人稍迟一些才想到这点，虽然他们不及泰勒将军那么坦率地说出来。可是，无论如何，在50年代，西方的政治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没有一个实际存在的德国军队的帮助，欧洲是不能保卫自己的。这就导致了西德重新武装。接着马上就是被分裂的德国较小的东半部的武装。现在，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们大约有50万现役军人，在四五天之内可以动员130万经过训练的士兵开赴前线。

为了抵消数量巨大的俄国军队、坦克和大炮，为什么认为士兵是必需的呢？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清楚地表明，在相互核威胁方面，苏联将达到美国的同样水平。1961年达到高潮的柏林危机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证明，这一见解是多么切合实际。既不是华盛顿也不是莫斯科（也不是任何一方的盟国或卫星国）准备为柏林或古巴冒打一场核战争的风险——它们都是对的。

人们看到苏联与西方都有能力相互以核武器威胁，因而取得了均势，因此产生了一系列新见解，这些见解远远超过了军事范畴。一个重新估计的时期——从50年代末到1967年，大约持续了10年——引导出总战略第三个时期。许多人把它称为缓和时期，我想把它叫做在安全有保障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时期。

1962年，正好处于重新估价力量对比时期中间，约翰·菲·肯尼迪总统在费城做了一次演说，对此欧洲人记忆犹新，因为他谈到了两根支柱：美国和欧洲，大西洋联盟的共同结构将来就要以此为基础。

由于已经取得了核均势或力量均势的见解日益增强，产生了第一次东西方之间的限制军备谈判和1963年的第一个禁止核试验条约，结束了在大气层中的核试验。5年以后，签

署了由苏联人、美国人和英国人谈妥的禁止核扩散条约，以后全世界许多国家参加了这个条约。他们庄严地承担责任，不生产、购买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1972年，由理查德·尼克松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签署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第一个条约，限制了战略洲际导弹的数量。特别是由于签订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对于双方来说，实际上是禁止建立当时在技术上可能的、抵御敌方的战略导弹的防卫体系。这样，就取得了最大的突破。

西方总战略第三个时期在1967年年底已经正式开始。联盟的各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由外交部长组成的委员会，以便确立联盟总战略目标的定义。在当时比利时外交大臣皮埃尔·阿麦尔的主持下，委员会提出了双重方案，后来北大西洋理事会把它作为决议而加以接受。作为第一个目标，阿麦尔的报告阐述和论证了西方盟国的愿望，即通过共同的防卫努力来保证他们的安全，以及通过共同的防卫能力来威慑苏联不要发动进攻。第二个目标是，在这种安全有保障的基础上向苏联提供合作。首先是通过共同商定的条约在限制军备的领域，然后是在经济交流的领域进行合作。

这种双重总战略导致了美、英、法、苏关于柏林的四国协定。它使联邦共和国能够在维利·勃兰特任总理的期间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了放弃使用武力协定。尽管越南战争还在继续，而欧洲人对美国在东南亚的作用持批评态度，这些协定，如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一阶段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一样，还是签订了。

尽管全世界开始受到通货膨胀的折磨，而其原因在美国，主要在于为越南战争筹集费用，但这一切还是实现了。在70年代初，西方总战略共同的推动力不受损害地顶住了布雷顿

森林国际货币体系以及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之间稳定汇率的崩溃。甚至在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冲击和北美、西欧的工业社会大规模失业开始以后，这个共同的总战略依然存在。当英国虽然有一点半心半意，终于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时，总战略在1973年甚至还有很大的进步。

1975年赫尔辛基会议形成了这个总战略时期的高潮。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包括苏联——作为欧洲大国——以及加拿大、美国都参加了会议。将加、美两国列为欧洲大国参加会议，苏联对此并未提出异议。赫尔辛基会议是欧洲合作时期，或通常称为缓和时期的顶点。此外“缓和”一词在1967年，在关于阿麦尔阐述的双重总战略的决议中曾收入正式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词汇中。今天有些美国人认为，这是一句骂人的话。但是他们错了，他们对于最近的历史知道的不多。

在赫尔辛基会议时期，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冲击使14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的西方工业国）的国际收支体系产生巨大的混乱。加强经济合作是必要的，因此在赫尔辛基顺便也决定召开西方主要工业国所谓的经济最高级会议。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因为可以说是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我创造设计了整个的行动。在赫尔辛基，我们毫不困难地说服了我们的英国盟友和美国盟友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此后不久毫不费力地使日本人也参加了。这样，相互协调主要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政策的企图获得了一个新的活动范围。这是在对世界经济有许多危险时期出现的。1975年底，经吉斯卡尔的邀请，在朗布依埃举行了第一次经济最高级会议。

旨在取得军事均势与合作的总战略的第三个时期，在

1976年以后不久解体。对此有一系列的原因：苏联向阿拉伯世界和非洲扩张，越南共产党人在苏联人的支持下入侵柬埔寨，而最后作为最富有戏剧性的发展，苏联入侵阿富汗。作为对入侵阿富汗的反应，发生了美国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欧洲国家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挪威和土耳其参加了抵制。1977年初，苏联开始大规模装备被西方称为SS-20的新的中程导弹。正如扩大俄国远洋舰队一样，这使人十分担忧。

总的说来，这一切表明，1970年至1973年与苏联签订的各种条约，并没有限制住可能的扩张主义行动的，由俄国人自己决定的活动范围，而俄国人却利用了这一事实。那些条约是涉及洲际的相互的核威慑，而从地理上来看，基本上是涉及欧洲（特别是柏林）的，而不是涉及东南亚、中东、非洲或中美洲的。

这些发展，特别是苏联以SS-20导弹扩充军备，导致了西方安全政策对抗性战略的产生：首先是预告，然后是在4年毫无结果的谈判以后，在欧洲的土地上部署美国新的中程导弹（潘兴式和巡航导弹）。由于部署潘兴式导弹（尽管其数量大大少于SS-20导弹），这一反应引起了苏联方面的忧虑。另一方面，自1980年以后，苏联人被华盛顿的某些声明搞得心神不定——这些声明我们在欧洲象苏联人一样完全听得清清楚楚，都是一些关于西方优势的必要性的话语。此外，美国的国防预算大大地增加。而且自1983年以来，关于星球大战（战略防御计划）的议论使苏联人更为不安。

自70年代末以来，我们处在总战略第四个时期——即重新处于冷战和军备竞赛之中。可以说我们以某种方式又回到了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第二个时期。此外，自1980年以后——令人觉得意外的是，几乎是同时——西欧

两个主要国家法国与德国在70年代发展起来的紧密合作松弛了。首先是由于吉斯卡尔·德斯坦换成密特朗，然后是波恩政府的更换。在同一时期，第二次油价冲击几乎波及所有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日本与一些亚洲国家（南朝鲜和新加坡等国）例外，对它们的影响是微小的。绝大部分的西方世界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失业人数增加到与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相似的程度，当时的大量失业引起了希特勒上台那样可怕的社会与政治后果。如果有20%的人失业，许多人就容易失去政治理智。

自1977—1978年以来，为与苏联缔结一个裁军条约作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其中之一，导致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草案的产生，虽然草签了，但没有批准，因为美国人不想批准这个条约，苏联人也是如此。当前在日内瓦所进行的努力，会产生积极的结果。我认为有51%的可能性，鉴于过去10年的经验，这是很高的了。但是没有任何人能肯定地预言其结果。（在里根总统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日内瓦最高级会谈前半年，我曾在耶鲁大学谈到这种估计，今天还需要修正。——赫尔穆特·施密特）今天，在欧洲我们仍然一直处于冷战与军备竞赛以及经济上相当困难的时期。

我总结了对苏联总战略的过去四个时期。第一，进行合作的尝试时期。第二，冷战与军备竞赛漫长的时期。第三，通过军事上的均势，以及同俄国人进行的多次谈判与合作，安全得到保障的时期。第四，新的冷战与重新进行军备竞赛时期。

从欧洲的立场来看，也许可以说，从杜鲁门政府到肯尼迪政府结束这段时期，西方共同的总战略达到了最大的限度，在尼克松—福特—基辛格时代也是相当高度一致的，虽然在